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的利益驱动分析

——一个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李 达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文章利用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强调利益异质性的基础上,借助 Hibbs (1977,1987)的派系政治周期模型与 Becker(1983)的利益集团理论,提出独立的 Hibbs-Becker 模型(以下简称 H-B 模型)来分析由于决策层偏好的不同而导致的中国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不同时期相关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不同压力对决策层偏好变动的影响,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利益异质性;政治经济周期;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03-0091-08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现实政治经济运作一直处于一党执政的状态,主流意识形态又一再强调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便导致了现实的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的利益(或偏好)的异质性研究的不够,在宏观层面上更是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在单一、稳定的执政党内部,也会由于决策层偏好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从而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不同的影响。改革以来的经济波动也印证了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从决策到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的漠视也大大降低了当前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度。

值得关注的是,近 20 年来,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及有益的借鉴。具体就宏观政策而言,与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政策由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决定的假设不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政策是由政治机制决定的,因而反映了大多数社会强势集团的利益。当然,在中国,由于政治运作的机制与西方不同,各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决策的影响渠道及力度也与西方大相径庭。但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偏好的不同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与西方派系斗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周期仍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而有必要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传导进行较为深入的分

收稿日期:2004-11-05

作者简介:李 达(1978—),男,山西长治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析。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本文借助 Hibbs(1977, 1987)的派系政治周期模型与 Becker(1983)的利益集团理论,提出独立的 Hibbs-Becker 模型(以下简称 H-B 模型)来分析由于决策层偏好的不同而导致的中国各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价值取向,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不同时期相关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不同压力对决策层偏好变动的影响,最后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战略变迁(如“两个大局”观)背后的利益驱动作了简要分析。

一、政治经济周期、利益集团与中国现实

一般来说,我们把因政治的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的经济周期称为政治经济周期(PBC)。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选举时间的不同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变化及经济产出的波动,反过来也就是说,政治家(特别是执政党)会试图操纵经济的走势,从而来提高其再次赢得竞选的可能性(或所谓的选举年经济)。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波动称为机会主义政治经济周期,例如 Nordhaus(1975)提出的 PBC 模型。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与执政党相对抗的反对党,机会主义动机似乎并不存在,对于中央政府来讲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无法简单套用上述机会主义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

然而,随着新政治经济学开始重点关注选民利益的异质性^①,派系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开始出现。它们一般都立足于选民利益的异质性,用不同政党对经济政策的不同偏好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周期。自从 Hibbs(1977, 1987)首先建立基本模型来分析由于选民的利益差别而导致不同政党对不同政策的偏好,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Hibbs(1994)本人也提出了政党目标随经济状况进行调整的新模型,证明即使选举结果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随着政党执政期的延续,也会存在党派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的情况。从这一理论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对现实的宏观经济波动还是有相当的解释力度的。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坚持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在不同时期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不存在异质性。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中行政力量主导的痕迹过于明显,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用派系政治经济周期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由于个体利益的异质性,利益集团很容易出现。利益集团理论开始于政治分析,后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经济利益的冲突。一般来讲,利益集团指那些具有特定的共同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人的“集合体”^②。西方集团理论认为,所谓公共政策,是指某一特定时间内,团体间的争夺所达到的平衡。对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及结果的研究一直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热点,贝克

尔(1983)利用一个简练的模型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行了数学描述,以此对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进行了深入分析,其结论是政策倾向于增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福利。这一理论涵义将在下文的 H-B 模型中得到具体的显现。笔者认为,尽管我国利益集团的渊源与作用形式和西方的利益集团有较大的差异,但其影响力的客观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当前的改革必然要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要求我们综合分析各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便合理引导,保障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

本文将借鉴基本的 Hibbs 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在修正其定义、内涵的基础上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迁与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转变之间的关系^⑤,并利用西方有关利益集团(Becker, 1983)的压力理论来说明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政策的偏好转变背后的利益驱动。

二、H-B 模型:制度变迁与集团利益压力之间的传导机制

1. H-B 模型的假设条件

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作如下三点假定:

第一,模型假定社会公平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是负相关的^⑥。基于这一前提,由于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异质性,可以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为两大利益集团:其一相对偏好更高的经济增长;其二则偏好更高的社会公平程度。由于这两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两大利益集团在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力量(或者说是国家最高决策的影响力)也不相同。

第二,政府力量的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或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来影响上述两个变量。这种政府主导型增长至少在以前及现在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实际上,在政府占有或能够配置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并直接或间接主导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及产出的再分配问题,此时的公平与效率之争也是政府的社会发展战略之争。

第三,执政党最高决策层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决策偏好,而决策偏好的变动取决于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两大集团的压力程度也互有消长。同时,我们假定两大集团对最高决策层施加压力都是有成本的,并且依据一般的经济社会规律,该压力成本边际递增,而从中获得的政策变更的收益是边际递减的。

2. H-B 模型的具体推理

I 阶段:政治决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分析

首先,当经济绩效或执政党的政绩(或整个社会损失)可以通过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程度来衡量时,基于 Barro-Gaden 模型^⑦,我们可以给出关于社会损失的线性函数:

$$L=U+\theta(\pi-\hat{\pi})^2/2 \quad (1)$$

其中: L 为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所带来的总社会损失, U 代表社会不平等度, θ 代表社会民众相对于社会不平等度的经济效率损失度偏离的权重, π 与 $\tilde{\pi}$ 分别代表实际的与民众合意的经济效率损失度。然后, 为了表示执政党中派系不同的政策偏好, 我们借用 Hibbs 模型, 将上述社会损失函数改写为派系的损失函数:

$$L_p = (U - \tilde{U}_p)^2 / 2 + \theta_p (\pi - \tilde{\pi}_p)^2 / 2 \quad (2)$$

在上式(2)中, 对于派系 P 来说, \tilde{U}_p 是其合意的目标社会不平等度, $\tilde{\pi}_p$ 是其合意的社会经济效率损失度, θ_p 是其相对于社会不平等度的背离与经济效率损失度背离两者的权重, U 与 π 分别代表实际的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 两者都是财政政策(或宏观经济政策)的函数。然后, 我们进一步假定, 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 也可以把最高决策层分为两个派系, 他们对政策目标有不同的偏好, 也即具有不同的损失函数。为了分析的方便, 我们把两个派系分别简化为左翼 Z 与右翼 R ^⑥。其中, 左翼 Z 比右翼 R 偏好较低的社会不平等度, 因此也能容忍更高的经济效率损失情况, 即能容忍更低的经济增长水平。另外, 相对于实际社会效率损失度高于合意的社会效率损失度(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合意的经济增长率)来说, 左翼 Z 觉得现实不平等度偏离于目标不平等度的成本更高。派系 Z 与 R 之间的区别可表示为:

$$\tilde{U}_Z \leq \tilde{U}_R; \quad \tilde{\pi}_Z \geq \tilde{\pi}_R; \quad \theta_Z \leq \theta_R \quad (3)$$

很明显, 要得到派系政治经济周期, 在式(3)的三个不等式中, 至少一项必须严格不相等。然后, 通过式(2)我们可以看出, 派系对政策偏好的不同会带来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 这里当然主要是指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的变化, 然后影响到经济损失函数的变动。另外, 根据前文的第一个假定, 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之间的替代关系。为了分析的简便, 这里我们假定:

$$U = -\pi \quad (4)$$

我们将式(4)代入式(2)求派系所追求的最佳政策目标。可以得到:

$$L_p = (U - \tilde{U}_p)^2 / 2 + \theta_p (-U - \tilde{\pi}_p)^2 / 2 \quad (5)$$

分别求 L_p 关于 U 的一阶导数与二阶导数, 可得:

$$L'_p = U - \tilde{U}_p + \theta_p U + \theta_p \tilde{\pi}_p \quad (6)$$

$$L''_p = 1 + \theta_p > 0 \quad (7)$$

由式(7)可知式(5)有最小值, 即派系能够得到自己的最佳社会损失。使 $L' = 0$, 我们可以得出派系最佳的通货膨胀率:

$$U_p = 1 / (1 + \theta_p) (\tilde{U}_p - \theta_p \tilde{\pi}_p) \quad (8)$$

根据式(8), 我们可以得出执政党内部派系 Z 与 R 分别进行最高决策时的社会失业率:

$$U_Z = (\tilde{U}_Z - \theta_Z \tilde{\pi}_Z) / (1 + \theta_Z) \quad (9)$$

$$U_R = (\tilde{U}_R - \theta_R \tilde{\pi}_R) / (1 + \theta_R) \quad (10)$$

由式(3)可得 $U_Z < U_R$, 同理可以得出 $\pi_Z > \pi_R$ 。因此, 当不同的派系进行最高决策时, 便会存在一个社会不平等度与经济效率损失度变动的政治经济周期。在左翼 Z 进行最高经济政策的决策时, 会有较低的社会不平等度和较高的经济效率损失度; 而在右翼 R 左右决策层时, 宏观经济情况便会与之相反。这充分说明, 即使在同一执政党内部, 由于政策目标偏好的不一致性, 也会导致不同发展阶段宏观发展战略的异质性。

II 阶段: 宏观经济决策背后的利益驱动

根据前文的假定条件, 决策层偏好变动的根源在于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反过来也就是说, 由于不同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绩效的不同, 两大利益集团对最高决策层施加的压力也是不同的, 归结起来, 两者之间的博弈才是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决策(或社会发展战略)具体变动的根本原因。接下来, 我们把两大利益集团都看成是“经济人”, 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来进一步分析两者行为背后的利益驱动规则。

我们把上述两个利益集团简称为集团 1 和集团 2。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想通过影响经济决策来提高其福利。但这种影响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其中, 集团 1 获得的福利依赖于它施加给最高决策层的压力(或成本)和集团 2 施加的压力(或成本), 这里我们分别将其表示为价格 P_1 和 P_2 。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集团内成员的数目以及使用资源的数量。集团 1 对政府的较大压力与集团 2 的较小压力表明集团 1 对政治程序更有影响, 使得集团 1 获得较多的社会福利。

我们考虑两大集团之间相互博弈下的均衡情况, 为了分析的方便, 假定两个集团的总影响固定不变, 这意味着规制活动是由每个集团的相对影响来决定的。每个集团在假定其他集团选择的压力水平条件下选择使其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由于较大的压力必然耗费集团较多的资源, 所以每个集团都不想提供过多压力。一个集团运用的压力较小即意味着其他集团的影响则会相对较大。考虑到运用压力的收益和成本, 给定任何 P_2 值, 能得到最优 P_1 值。 $\psi_1(P_2)$ 是集团 1 的“最佳的反应函数”, 它描绘了集团 1 相对于集团 2 而言的最佳压力水平。如果集团 2 预期运用 P_2 的压力, 则集团 1 的最优压力水平为 $\psi_1(P_2)$ 。集团 2 施加的压力越大, 集团 1 的影响越小, 集团 1 会运用更多的压力以抵消集团 2 较大的压力以寻求最优。这意味着 $\psi_1(P_2)$ 随 P_2 上升而上升(见图 1)。

当两个集团都没有动因改变其压力水平时, 便形成政治均衡。假定集团 2 运用压力 P_2^* , 则 P_1^* 为集团 1 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 集团 1 运用压力 P_1^* , P_2^* 为集团 2 福利最大化的压力水平, 则 (P_1^*, P_2^*) 即为政治均衡点。政治均衡点由两个最佳反应函数 $\psi_1(P_2)$ 和 $\psi_2(P_1)$ 的交叉点来确定, 在这个点上, 两个利益集团同时施加最优压力水平。但政治均衡并不一定是帕累托最优, 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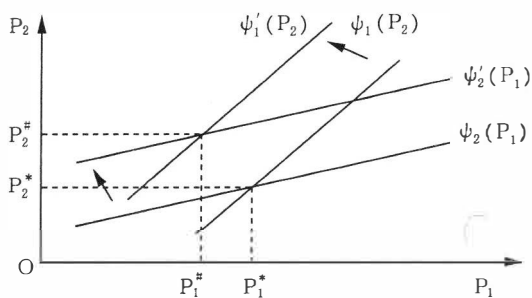


图1 两大集团之间的博弈分析

个集团可以较低成本获得同等水平的相对影响。同时,当其中一方由于外部原因(如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其压力水平时,都会相应地导致另一方压力的变化,并最终形成新的均衡点。在图1中,新的均衡点表示为($P_1^\#$, $P_2^\#$)。可见,由于利益的异质性及不同时期宏观经济绩效的不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导致了最高决策层政策偏好的变化及经济政策的调整。

三、H-B模型的结论与政策涵义

通过对模型的前提及推导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由于个体利益的异质性,即使在中国当前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各种具有不同宏观政策偏好的利益集团也是客观存在的。各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的异质性是最高决策层内部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的深层次原因。利益集团的博弈、决策层宏观经济偏好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传导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图2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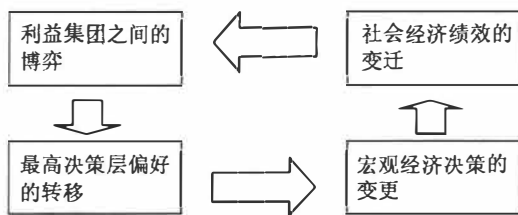


图2 简单的政治经济互动图

第二,上文中,两大利益集团对决策层施加压力的大小对比决定其对政策的影响力,而两者又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及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自己施压的程度。这便导致如下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两个集团施加压力的边际成本均会随之递增,而其收益亦随之递减,因此,对于偏好更高的社会平等度的集团来说,当前社会平等程度越高(也即社会经济的增长越缓慢),其对决策层施

加压力的边际收益就越低,因此也就越没有动力对最高决策层的宏观经济决策去施加压力。但反过来,在这个时候,偏好更高经济增长度的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因而也就越有动力,并愿意付出更高的压力成本去影响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过程。如此,与两大利益集团压力消长相伴随的是最高决策层派系间力量的消长,这同时也表现为在不同时期最高决策层对相关社会发展战略偏好的转移。另一方面,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施压成本往往会呈现交替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利益集团之间为影响最高层的政策决策而进行的竞争耗尽了大量经济资源,导致帕累托非最优效率,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双方都保持较低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均衡。

第三,通过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从长期看来,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相机抉择并不是最优的社会选择,压力成本的交替上升与决策层偏好的阶段性转移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浪费。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决策机制的优化,因此必须对相关利益集团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就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经验来看,对利益集团及派系的可行性约束是使相应的宏观政策目标“宪法化”,并通过相应的机构设置来尽量摆脱利益集团或派系对其的影响。比如说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法律中,并明确规定由独立的货币机构来对其负责。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H-B 模型,可以对邓小平的“两个大局观”进行简要的分析:我们将东部与西部简单地看成是两个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水平既定的情况下,由于东部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因而相对更偏好效率;反过来,西部则更偏好公平。考虑到两者施加压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当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社会平等程度越高时,意味着东部利益集团的潜在边际收益较高,因此就越有动力去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压力;反过来,当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高,社会平等程度越低时,则西部利益集团潜在边际收益较高,其压力也就相对较大。不同时期两大利益集团压力的不同反映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偏好变迁上,也自然反映在社会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差异上。

最后,该模型的缺陷与不足。笔者以为,尽管该 H-B 模型利用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派系政治周期理论与利益集团竞争理论,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现实情况,为分析政治决策与社会经济绩效,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社会发展战略之间的传导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框架,但作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仍然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该模型在表现形式上较为松散,整合性不够。同时,由于无法在对利益集团的压力成本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进行数学描述,因而模型的微观基础较为薄弱,有待进一步充实。

注释:

①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把事物的不同特征称为“异质性”,或是利益的“非一致性”。

- ②[日]迁中丰:《利益集团》,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 ③在最初的模型中,Hibbs是由观察美国两个政党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开始的,这又源于两党选民经济偏好的不同。尽管在中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选民政治,但由于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各利益集团之间具有的不同偏好,我们完全可以将Hibbs的观点应用到中国当前的现实经济决策中。
- ④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用一定时期的基尼系数与GDP增长率来分别表示前者及后者。
- ⑤该模型最初用来表示选民的不满意程度,其详细解释可见Allen Drazen(2000),但在本文中则用来表示派系对社会损失的不同偏好。
- ⑥这里的左右之分只是为了经济分析的方便,并无其他特定的涵义。

参考文献:

- [1]Allen Drazen.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Austen-Smith D. Interest groups; Money, 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A]. in D. Mueller ed. Perspectives on public choice; A Handbook[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Becker.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56).
- [4]Hibbs D. Political part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5, (71).
- [5]Hibbs 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croeconomic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Lewis-Beck. Economics and election[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8.
- [7]Nordhaus W.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5, (42): 169~90.
- [8]Torsten Persson, Guido Tabellini.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ing economic policy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A Study of Interest Driving on the Changing of Chinese Social Developing Strategy: A New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

LI Da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ic theo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independent model of Hibbs-Becker (H-B model) by means of Hibbs' model of in-group political period and Becker's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 emphasizing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est.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t value tendencie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which are resulted from the deciders' taste. Meanwhile, it also analyzes how the stresses from the interest groups in different periods affect the deciders' taste,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n the changing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ing strategy.

Key words: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heterogeneity of interest;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interest groups

(责任编辑 金澜)

(上接第 66 页)

The Interactions of Announced Earnings,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CHEN Gong-meng¹, GAO Ning²

(1. *China Venture Capital Research Institute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2. *Guo Tai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51803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nings and dividend announcements made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arnings, cash dividends, and stock dividends are announced concurrently in China and so this allows for the tests of their information usefulness and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three signals. Based on a data set of up to 1,232 announcements, we find that unexpected earnings, proxied by earnings chang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bnormal returns, which shows that earnings are used by investors in setting market prices. If the sign of the unexpected stock dividend (increase, decrease) is the same as the sign of the unexpected earnings, then the earnings signal is stronger. If the signs are opposite, the earnings signal is weaker. Unexpected cash dividends have little impact on the earnings signal, which i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dividend irrelevance arguments. Further, our results are robust across a number of sensitivity tests.

Key words: earnings, dividends, information content,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 金澜)